

示说“如果当上总理怎么怎么”。谁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和看法。韩这个政治圈子，表面上看是一种气氛，但聚集起来的人，则不限于宗派或同乡。固然当时金州派在伪国很占上风，但这些人好多都不是以同乡关系而集结，是“物以类聚”而凑到一起的。韩是自认聪明的人，因此他对周围的人或部下，都是特别注重才干的，这样一来，虽属同乡，因他的个性所限，非人才的，自然就淘汰了。事实上有大多数不是金州帮而是辽阳帮的人，也经常都是他的坐上客。这就说明他的私生活的政治意味了。

总括来看，韩云阶在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14年中，积极与日本勾结，围剿抗日军队，又仰仗日本关东军力量，在宦海中几起几伏，政治野心极大，梦想当伪总理，是个罪恶累累的大汉奸。伪满垮台后，韩云阶回原籍金州，假称病死埋葬，以金蝉脱壳之计出走台湾，又由台湾去了日本，在岸信介等人的帮助下，苦度残年，直至命丧黄泉。

（摘自《伪皇宫陈列馆文集》，1991年。）

我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

于静远

1923年我从瑞士炮兵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因为我父于冲汉的关系照应，1924年3月我到哈尔滨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做少校参谋长，1928年升为中校参谋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该任上。9月下旬，张作相从天津来电，令我去天津述职，我考虑他一定是要了解“九·一八”事变后的

情景，而我对此了解不多，为了找个好对策，我匆匆回到辽阳家中，找我的父亲商量，想了解一下日军侵略东北的情况。父亲什么也没有告诉我，推说他不知道，并将我留下。于是我令人回哈尔滨向参谋长赵全麟报告，说我未得到任何材料，不能去天津了。然后我就此在家住下了。

我住下后，父亲急忙赴沈阳，并于11月9日组织了奉天省自治指导部，他当了部长，而且安排我当了指导部顾问。此时他的身体比较差，所以我一上任他就让我代理他的部长职务。

我由辽阳赶到沈阳后，指导部的另一个顾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附今田新太郎大尉带着我和其他几个人去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见到我们，本庄挺高兴，对我们讲了一些话，其主要意思是：日本仗义出兵，帮助东三省把张家政权打倒了，除去了虐政，现在你们要把地方自治办好……本庄说完后，我们连连点头称是，然后退了回来。

上任之后，面临的是在各县设立自治执行委员会。于是我以代理部长的身份对各县的委员会成立情况，亲自去督促，并在各县自治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讲话内容自然是以本庄给我们讲话的内容为宗旨的，并特别强调要用办好自治的实际行动，去感谢日本关东军仗义出兵为我们除掉虐政的恩德。

为了更好地办好自治，使关东军满意，伪自治指导部还成立了自治训练所，我兼任所长。当时开办这个训练所的目的是想培养一批有自治指导才能的人，其实说穿了，就是造就一批帮助侵略者统治中国人的工具。第一期收学员十几名，其中中国人五六名，日本人七八名，朝鲜人一名。这个训练所在伪满政权成立后，就归入大同学院了。

由于我在自治指导部的工作卓有成效，所以很得本社繁的赏识，因此1932年2月由关东军授意召开的伪满“四巨头”（即

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会议时,我也被邀参加。

伪满政府建立后,关东军根据其统治的需要,解散自治指导部,建立了协和会。协和会建立之始,我就参加了筹建工作,一同工作的是原指导部的日人同事如山口重次、小泽开作等人。然后我当上了伪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总务处长并兼伪奉天公署秘书。

“九·一八”事变引起了国际上舆论大哗,于是1932年5月国联派调查团到“满洲”调查。我和奉天省公署秘书长阮振铎、《满洲评论》的编辑小山贞知一起前往沈阳大和旅馆,向调查团介绍情况。我们进屋后,有一位精通汉语的调查团成员和我们交谈起来,他问我们协和会成立的时间。没等我们答话,小山贞知忙回答说:“是‘九·一八’前成立的。”那个人又问:“协和会有多少会员呢?”小山贞知又马上抢着说:“有会员20来万人。”那个人又问我和阮振铎是干什么的,阮振铎说:“我是医生。”我说:“我是个落伍军人。”后来我们又谈了一会,最后调查团的人说:“我一定把你们的话转告李顿卿,你们先请回吧。”我们三人见目的已初步达到,就走了。

1932年6月中旬,我受协和会的命令代表伪满青年赴日本,请求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到日本后,我首先拜见了日本外务省大臣斋藤,把伪满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写给斋藤的信交给他,并向他讲出了我此行的目的。他说:“日本承认满洲国只是个法律手续问题。”我赶紧说:“请阁下下决心来决断这件事情。”为了表示满洲国的友好态度,以促使日本早日承认满洲国,我到各权威人士处游说,见过拓务省大臣永久柳太郎,见过陆军省大臣荒木贞夫,见过海军省大臣岗田启介、文部省大臣鳩山一郎以及民政党总裁若槻礼次郎。除此以外我还在东京《朝日新闻》讲堂讲演,讲演词的内容大意是:感谢日本仗义援助

满洲国的成立，满洲国成立后治安安定了，工商业有了发展，产业开发很有希望，在民族协和的基础上具备了独立国的条件，请求日本赶快承认满洲国。在东京讲完后，我又先后到名古屋、京都、大阪、满冈等地演讲，内容和在东京时讲的差不多。

就在我到处喧嚣日本仗义拯救中国东北，大谈“满”日友好，满洲国存在之必要时，国内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抗日浪潮汹涌澎湃，我这一系列表演无疑是助桀为虐，为同胞们所不齿。

1932年11月12日，我父亲病故了，他生前与满铁合办的振兴铁矿有限公司就由我继续与满铁合办下去了，每年鞍山制铁所仍旧给我36万元伪币。还有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曾以他出山场，日人冈村俊子出树苗的形式，在本溪县内祁家堡子的连山关、下马塘一带合伙造林，共植树300余万株，但当时没有签合同，是我族兄于静涛和我一起与冈村补订了合同。合同规定，将来卖了树木出山场者得40%，出树苗者得55%，余5%作为经营经费用。合同签好后到奉天日本总领事馆立了案。使出卖祖国主权的行为了合法化了。

父亲在世时，为建立伪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日本侵略者的赏识。他死后，日本政府奖给他勋一等旭日章，伪满政府发给他建国功劳金30万元。日伪政府对我父亲的忠心效劳所给予的褒赏，对我起了很大的鼓励作用，我工作也更卖力气了。1933年11月，我被伪外交部派为驻东京公使馆参事官兼学务处长。翌年4月我去日本赴任，此时的日本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到处是花海人流，我“有幸”参加了天皇裕仁的观樱会。

在东京的几年里，我大出风头，不断在各种活动中露面，名声日显。1935年夏，公使丁士源被调回国，我得以代理公使职务，此间，我到各国驻东京的大使馆、公使馆投名片拜访。当时我很想使自己正式留任公使，可惜愿望落空。1935年7月伪

满驻东京公使馆改为大使馆，伪参议府参议谢介石被任为驻东京大使，我只好仍做我的参事官兼学务处长。

在东京的几年里，我一直兼任着伪满协和会驻东京委员。协和会当时在东京设一事务所，常驻的人是伪满协和会职员日本人五郎丸保，委员是多田骏、浅源（名忘记）、片仓衷。1936年夏天，片仓衷找我陪同他到东京会馆，就协和会在伪满政府中的地位问题与日本众议院议员斋藤隆夫等人进行商榷。因为当时日本国内有“正义团”的组织，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军国主义组织，他们对“满洲国”搞的所谓的民族协和都不能容忍，在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的支持下，要用“正义团”代替“协和会”，并已经着手在满洲的一些大城市成立了“正义团”，使协和会的存在遭到威胁。我和片仓衷就是为此去找斋藤隆夫等人的。通过我们东奔西走、摇旗呐喊，1937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对协和会给予了肯定，并将我调回伪满洲国任协和会中央本部长。

我匆匆赶回满洲赴任，到职后马上着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扩充预算使之由几十万元增为600万元；第二件事是在组织上实行二位一体制，即伪满省、市、县长均兼任伪满协和会省、市、县本部长；第三件事是为充实协和会力量，为协和会培养了青年骨干。

1937年6月，日本侵略者为欺骗世人耳目，做了一件猫哭老鼠的事，以伪满协和会名义埋葬张作霖的灵柩。张作霖1928年皇姑屯被炸后，灵柩一直停在沈阳小东关珠林寺。这次接关东军的旨意，由我和协和会中央本部总务部长甘粕正彦、关东军司令部附辻政信同赴沈阳办理此事。我们三人护送张作霖的灵柩由小东关一直走到小西边门外的车站，然后专挂了一辆车厢送往高山子下葬。此举当时曾蒙惑了一些人。

随着日本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活动也风起云涌。为了强化殖民主义统治，使“满洲国”的诸项政策法规令得以贯彻执行，协和会组织了协和义勇奉公队，从事传令、防空、防谍等一些活动，强化了统治手段和种种政策的日益加深的迫害，使老百姓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我因为在协和会工作，所以和甘粕正彦接触较多，我的工作他非常满意。甘粕正彦当时在满洲是个神秘的人物，官职不显赫，但说话很管用。在他的关照下，我于1938年2月被调到伪新京特别市任市长，仍兼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对此我很感谢甘粕正彦和日伪政府，自然更加卖力地为推行法西斯统治做吹鼓手，对日伪政府颁布的任何政策法规都认真地去执行。我用历尽艰辛的苦难同胞的鲜血和泪水，铺洒了一条使我升迁的路。1940年我被调任伪产业部大臣，在当时那种社会形势下，这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对于这样的重用和信任，我心里十分明白，也更不敢懈怠，便以更高的热情去工作。1940年8月，伪满中央机构调整，产业部改为兴农部，我仍任大臣。

虽然百姓吃了数不清的苦，而我却是飞黄腾达，今天出席关东军要人宴请，明天去朝鲜观光，后天又去东京谒见天皇，每得此宠遇之后，我都要感慨激昂地给属下大讲一通“亲邦”日本的仗义援助以及协和、共荣等鬼话。

1941年以前，鞍山的振兴铁矿公司还以合办的名义存在，但到1941年我便将矿权公开地卖给了“昭和制钢所”，得款60万元。

伪满的最后几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处于垂死挣扎阶段，更加疯狂地掠夺我东北的一切资源，抓劳工、统制钢铁、控制经济、出荷粮谷、强征马匹、滥砍森林、强买蚕丝、占用土地，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一段时间里，却正是我得意非凡之时。1941

年秋天，伪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会决定，要求协和会各分会协助伪满各级政府推行伪满中央政府颁布的《产业统制法》。1942年又要求协和会各分会协助各级政府推行伪满中央政府颁发的储蓄政策等项活动。我虽然早已迈入行政机构，但对协和会的这些工作一直十分热心。1943年秋天，伪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开会时，我被请去发表演说，我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民族协和理论，阐述伪满政府与协和会的表里关系以及各民族互相团结、一心一意援助“亲邦”之战的重要意义。

1944年伪满政府又强制实行了粮谷的“报恩出荷”。其实当时农民们的“出荷”任务已经是力难承担了，但仍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出荷”量，因而导致许多农民以菜代粮，无法度日，无论乡村、城市饿死者不计其数。虽然如此，协和义勇奉公队仍毫不手软，到处“督励出荷”。我也于这年的12月当了伪经济部大臣，并一直兼协和会中央本部委员。我在伪满洲国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一直担任着伪满洲国的重任，由此可见我在关东军和伪满政府中的地位。

(刘泽瑛整理)

伪满大臣于镜涛（节录）

高丕琨

从普通路警到中东路路警处副处长

于镜涛字鉴寰，1898年生于现在的长春市南湖公园附近一个叫袁家窝堡的小村庄。幼时念过几年私塾，上了高小，还上